

876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

1984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编委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赵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27.75 插页5 字数595,000

1987年2月第1版 198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800

统一书号: 10186·699

定价: 9.80元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编委会名单

编 委

尹恭弘	石昌渝	刘乃昌	刘文忠	刘世德
牟世金	李修生	陈毓璞	郑孟彤	胡世厚
费振刚	徐公持	曾扬华	黄清泉	魏同贤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主 编

刘世德 徐公持

前 言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古典文学研究是一门历史最悠久的学科。从孔夫子“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开始，这门学科就已存在了，而且绵延数千年，略无断绝。古典文学研究又是一门根基最深厚的学科，研究对象浩如烟海，研究论著汗牛充栋，就资料积累和成果的丰富性来说，是任何其他文学分支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古典文学研究又是力量极雄厚的学科，历来的文学研究专家，以治古典者居多，近代一些以新文学创作名闻中外的大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也无不兼为功力深厚的古典文学学者。

解放以后，古典文学工作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古典文学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对文学遗产作重新认识。特别是“文革”动乱结束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的极左错误逐步得到纠正，古典文学工作也从此进入新境界。就近年来的成绩看，无论从质或量的方面说，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文革”前每年出版古典文学书籍（包括古籍原著和研究著作）不到一百种，而近年来则每年超过了四百种，“文革”前每年发表古典文学论文平均不到四百篇，而近年来则每年超过了二千篇。至于研究水平的提高，也是有目共睹的，今天的研究无论在深度广度上，都明显超过了“文革”前，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学术自由方针的逐步深入人心,研究工作者的思想的逐步解放,古典文学领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那就是研究的视野有所拓宽,研究手段有所丰富,研究方法有所改进。我们看到,横向和纵向的综合性、联系性的研究,对某些文学史现象的深层探讨,对某些发展规律性问题的系统阐述,与其他艺术品种的渗透研究,还有与不同时代文学及国外文学的比较研究,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我们还看到,某些研究者正在运用一些新的方法作研究的尝试。这些方法是否能有效地推进古典文学研究,现在还难作结论,但这种尝试本身是应予鼓励的。总的来说,当前古典文学研究正在循着开放性的道路演进,正在酝酿着一场突破。

在此种形势之下,为反映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整理、出版等工作的进展和成绩,为向广大古典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提供可靠翔实的综合性资料,我们决定自一九八四年起,编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每年一卷,逐年出版。下面就本年鉴所设各栏目作简略说明。

一、述评。主要以文学史时期及体裁为依据,同时参考当年度的实际情况,划分出若干专题,分别对一年来的研究工作进展进行述评。述评文章要求具有:(1)总结性。总结本年度内取得的成就,也可以指出存在问题或不足。要反映出研究工作的基本趋向,突出重点,其余仅作点将录式的一般性介绍;(2)客观性。以述为基础,述中有评。对不同学派和学术观点作客观介绍,评论要态度慎重,避免任意褒贬。本栏是整个《年鉴》的纲领。

二、论文提要。对本年度公开发表的质量较好或有独到见解的研究性文章作提要介绍。在一般情况下,介绍的论文

控制在三百篇以内，总字数控制在十五万字以内。

本栏内还包括一定数量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论文提要。

三、论文、书籍目录。收入本年度公开发表的所有有关古典文学的文章目录，及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出版的有关古典文学的新书目录，力图体现一个“全”字。

本栏内还辑入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论文目录。

四、纪事。以时间先后为序，扼要纪述本年度内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活动情况及学术消息。

五、古典文学工作者人名录。收入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编辑出版单位及其他部门的古典文学工作者人名（限讲师或相应职称以上者），简介其情况，以利于古典文学工作者之间的相互了解，开展学术联系及交流。

总之，通过以上栏目设置，我们希望尽可能地将本年度内的古典文学研究的各方面状况，包括人、事、论著等状况，全面客观地反映出来，在我们的设想中，这是一部中型规模的学术研究参考书，也是一部资料性很强的工具书。

由于《年鉴》的编纂尚属初创，编者毫无经验，又加水平所限，缺点在所难免，尤其是有些栏目着手匆促，编写比较粗疏，而《年鉴》时间性强，出版付印刻不容缓，不能作更多的充实修订，在此敬请海内学者专家多赐指教，以便我们在编纂下一卷时改进提高。

徐公持

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

目 录

前 言	徐公持 (1)
-----	---------

• 述 评 •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述评	费振刚 (1)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述评	刘文忠 张巨才 (12)
唐五代文学研究述评	郑孟彤 王景霓 (25)
宋辽金文学研究述评	刘乃昌 王少华 (38)
元明清诗文研究述评	尹恭弘 (52)
明清小说研究述评	黄清泉 (66)
《红楼梦》研究述评	曾扬华 (78)
古代文论研究述评	牟世金 (91)
古典戏曲文学研究述评	李修生 (105)
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述评	魏同贤 (116)

• 论 文 提 要 •

全国古典文学研究部分论文提要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	(133)
总 论	(133)
先秦两汉文学	(153)

魏晋南北朝文学·····	(182)
唐五代文学·····	(201)
宋代文学·····	(234)
元代文学·····	(264)
明代文学·····	(287)
清代文学·····	(309)
近代文学·····	(334)
· 台湾地区·····	郑永晓编 (341)
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部分论文提要·····	徐公持编译 (351)

• 论著目录索引 •

全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目录索引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编	(372)
总 论·····		(372)
先秦文学·····		(401)
两汉文学·····		(431)
魏晋南北朝文学·····		(444)
唐五代文学·····		(473)
宋辽金文学·····		(541)
元代文学·····		(585)
明代文学·····		(601)
清代文学·····		(637)
近代文学·····		(706)

香港、台湾地区·····	旭初编 (727)
日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论文目录索引·····	允平编译 (756)
英、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	
论著目录索引·····	慧珉编译 (774)
古典文学新书目索引·····	朱镜编 (781)
古典文学研究纪事·····	国斌 田明 (823)
全国古典文学工作者人名录·····	(832)

述 评

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述评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费振刚

一、先秦文学

中国古代神话的研究,在神话的产生、神话的“消失”问题上展开了讨论。周明《试论神话范畴的狭义性和广义性》一文提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神话的论述“用于原始神话,那无疑是正确的。但具体的大量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文学史上产生的神话,远不止于原始社会。”作者认为神话在一定条件下会消失的看法,是由于一些神话研究者对马克思“任何神话都是在想象里并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赋予自然力以形体;因此,随着这些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论述的片面理解,他认为“生产力的发达与否,自然力的实际上被支配与否,都只是相对而言的。社会生产力没有绝对的发达,自然力也没有绝对地被支配。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不可能绝对地支配自然力。……自然界发展的无限性和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认识能力和支配自然能力的有限性就构成尖锐的矛盾。这种由生产力不发达决定的认识方面的矛盾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必然要产生幻

想(神话)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作者赞同用狭义的神话和广义的神话的概念。对于这样的看法和神话的分类,许多同志表示不赞成,他们认为“神话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原始性。”其主要特点是:“(1)、神话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而是原始社会里包含科学、哲学、神学、史学、文学在内的浑然一体的意识形态;(2)、神话反映的矛盾主要是人和自然的矛盾;(3)、神话的创作方法,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广义神话的提法,把神话学研究的对象,范围无限扩大,这样,不仅对神话本身无法作出科学的说明,对一些不属于神话的幻想性民间故事也无法作出科学的说明,其结果,必然对整个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带来困难。”(见《把神话研究推向深入——昆明神话讨论综述》)围绕着神话的特点还有一些文章,如毛建华《试论神话内容的二重性》提出了神话内容不仅反映先民希望支配自然力的一面,还反映先民受自然力压抑(在阶级社会初期,受剥削压迫)所产生的消极观念的一面。郑谦《神话与科学的交叉点及分界线》从五个方面论证了神话与科学的联系和区别。还有一些神话研究的文章,触及了中国神话产生和发展的问題,王钟陵《我国神话中的时空观》、费秉勋《论太古神话的悲剧精神》等,从不同方面,结合我国的实际,对我国神话的一些特点作了阐述,有一定的深度和启发性。

《诗经》研究的各类文章数量较多,约在百篇左右。其中大多数文章是对《诗经》具体作品的主题、艺术特点以及词义的研究。鉴于封建时代经师的愚昧迂腐和对《诗经》解释的穿凿附会,自“五四”运动以来,现代学者研究《诗经》多从具体作品入手,运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的方法,吸收历史学、民俗学研究成果,力求对作品的一词一字的解释尽可能符合其

本义,以达到对作品思想内容及其艺术表现的确切理解。许多文章赞扬了现代学者如郭沫若、闻一多、于省吾等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在他们的基础上,或使用他们的方法,对《诗经》的一些作品进一步进行研究,它们涉及的作品,既有传统的名篇,也有过去不为人所重视的篇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诗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由于传统经学注疏对《诗经》的重重包围,做去芜存菁的清理是相当困难的,所以这些文章得出的结论尚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仍可以从不同方面给人们以启发,是朝着弄清《诗经》真面目的必要的阶梯。有的文章,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于如何估价传统注疏的作用提出了看法,王德培在《略论诗经的起源、性质、演变和史料意义》中说:“近代学者往往不顾传统注释,任意解诗。这种作法,从史科学角度看,很不可取。范文澜同志认为改变诗义和训诂别立新说,是应该慎重考虑的。《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学史研究《诗经》的很多,尽管从文学欣赏的角度,他们可以赋予诗以很多生动的今译,但治史的人决不能跟着文学史家的脚步走。”日知在《从君政、王政到贵族政治——毛诗·魏风所见中国古代社会》中说:“自为之说之门一开,说诗就太过方便了。以魏诗各篇而言,你可以说这篇是奴隶所作,那篇是劳动人民所为,另一篇则出自佃农之手,任意解释,令诗篇为自己主张服务,认为这是奴隶社会的诗,那是封建社会的诗,随心所欲,无所不可。然而这种作法,显然不是治诗的道路,不足以言历史,不足以考察社会,踪迹文明。”文学研究不可与历史研究脱节,更不可对立,对于他们文章中所阐述的具体结论我们可以有不同认识,但他们提出的《诗经》研究的途径、方法是值得研究文学史的同志重视的。

关于《诗经》的综合研究文章中,有的是对题材相同、相关作品的分析,赵洪林《中国古代史诗的考察》在对“史诗”概念的演变作了叙述之后,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是反映我国古代社会的史诗作品,并通过我国古代社会和古代希腊的比较,论证了中国史诗的特点,指出《生民》诸诗“是原始文化的高峰和顶点,又是带入文明社会的珍贵遗产。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它开中国叙事诗的先河,无论就艺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具有开创性和典范性,给后人以可资借鉴的启示。”盛广智《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对西周春秋之际统治集团中各阶层人士以政治生活为内容的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历史传统和作者身分做了分析。两篇论文都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有助于对有关作品的理解。此外,还有一些对《诗经》的表现手法、修辞技巧和用韵、句式以及前人《诗经》研究的贡献进行综合研究的文章。

先秦散文研究中有一些是从文体方面进行考察的文章,熊宪光《先秦政论文略论》在指出由于那时文学与史学、哲学浑然一体,尚未“分家”,因此用我们今天的眼光衡量,先秦散文中堪称为“纯粹”的政论文并不多,其大量存在的是具有政论色彩的文章这一事实后,对先秦政论文在内容上、形式上的特点做了分析,提纲挈领,言之有物,勾勒了先秦政论文的概貌。阎笑非《关于先秦寓言的几个问题》、赵沛霖《试论中国寓言的起源》都论证了我国寓言的起源,两篇文章的结论不同,阎文首先提出“先秦寓言源远流长,它最初产生于民间,是当时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经验、教训的形象而深刻的总结,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接着对先秦文献中一些寓言的出现和演

变作了考察，强调了寓言同神话、传说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它的结论是：“因为寓言故事在先秦时期大量地出现在诸子哲理散文和一些历史散文中，便认为先秦寓言大约产生于春秋末年，形成于战国初期，这显然把问题看得过简单了。”赵文认为“与那些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的神话和原始诗歌相比，寓言文学是一种自觉的有目的的艺术创作，在历史上显然是后起的。”它的结论是：我国的寓言文学在春秋末期产生，并随即在战国时代出现了一个寓言文学的创作高潮。但它又认为一些研究所揭示的只是寓言文学的繁荣原因，而没有涉及到寓言的起源问题。在论证寓言起源时，赵文同样强调了寓言与神话之间的关系，但它论证的侧重点与阎文不同，强调了由于时代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寓言文学对神话的改造，在论证了战国时代一些寓言的来龙去脉之后，着重指出：“寓言是对于神话的继承，又是对于它的否定。也就是说，寓言的起源既有其神话的根源，又是对于神话改造的结果。”章学诚说：“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开展各种文体在先秦时期的产生、演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先秦散文的地位及影响的认识。

还有不少文章是分别阐述一些历史散文、诸子散文著作的思想倾向、艺术特色的，如郑君华《〈左传〉情节与人物描写的形象性的特征》、赵喜范《〈战国策〉的论辩技巧》、王景琳《画龙点睛，相得益彰——〈庄子〉散文艺术论之一》等，都能抓住所论著作艺术表现的重要方面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有的文章还通过比较的方式来突出所论著作的各自的特点，如赵一璋《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谈〈庄子〉的浪漫主义兼及庄孟比较》，金家兴《〈史记〉人物描写的艺术创新——〈史记〉与〈战国策〉的比较研究》等。此外还有一些对先秦散文中的著名篇章

思想和艺术特点作具体分析的文章。

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历年来均为热门的学问,本年内发表论文的数目当在百篇左右。《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转载了日本学者的两篇否定屈原存在的文章,由此引起了我国学术界对于自二十年代廖平,以后是胡适、何天行等人关于否定屈原存在、屈原的作品系后人伪托等论点的再认识、再辨析,全国不少学术刊物发表了有关的论文,分别在四川、湖北召开的屈原学术讨论会也对此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同志一致指出:尽管日本学者的论证方法不同,但他们所持的论点,实与廖平等人相同,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少论文回顾了自二十年代围绕屈原及其作品真实性的讨论,指出了屈原否定论者在立论和论证上的主观武断和形而上学偏向,并从《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可靠性,淮南王刘安与楚辞的关系,《离骚》等屈原作品的创作个性以及它们与楚国文化、南方民族风俗的联系等多方面论证了屈原及其作品的真实性,表现了我国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

关于屈原族别的讨论,恐怕短时期还无法取得一致认识,但它却进一步推动了楚辞与南方文化、楚地风习关系的研究。林河在《试论楚辞与南方民族的民歌》中提出“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文化的瑰宝。屈原也是第一个以口语入诗的作家,从内容到形式,处处都闪烁着南方民族民间文学,特别是民歌的灿烂光芒。”论文通过对古今南方民族民歌与楚辞的分析,具体指出了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论文中对于《说苑·越人歌》注音的译解,似为前人所未及,值得重视。讨论这类问题的文章,还有王锡三《试论屈原骚赋与楚族巫舞的关系》、何丹尼《从九歌看民间文学对离骚的影响》等。

在关于楚辞与屈原的文章中，还有相当数量是对屈原思想和作品进行具体分析的，其中有一些文章力图从比较新的角度来解释屈原的创作成就，如金开诚的《论作为艺术思维经验的屈原超现实想象》，是从艺术思维发展的历史角度，通过屈原创作与神话创作的对比分析中，阐述了屈原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曹海东的《〈离骚〉在时、空与我的关系中展现的诗人自我形象》，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对《离骚》抒情主人公形象塑造分析的特点。

二、两 汉 文 学

两汉文学研究近几年来有所加强，数量不仅多，而且涉及了过去很少涉及的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影响两汉文学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的研究。近几年有些文章谈及了汉代儒家思想对两汉文学的影响，赵明的《道家思想与两汉文学》则论述了在独尊儒术的环境中，道家思想对文学的影响，提出了“只有道家的批判怀疑精神以及它的思辨的、理性的哲学，才能予汉代那种僵化了的儒学以强有力的否定和冲击。学术思想上的这种儒道互抗(互补)的态势，不仅作用着社会思潮的变化，而且影响着文学的发展。”万光治《论汉赋与汉诗、汉代经学的关系》不仅论及了汉赋的发展，而且论及了汉代经学对各体文学的影响，指出：“两汉之世，赋、诗与经学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汉人重经，诗经学因之兴起，结果带来了诗歌创作的萎缩；汉人好赋，赋文学因之大盛，却付出汉诗衰退的代价。经学之士鄙薄辞赋，又往往技痒，时有所作，赋家属文，唯恐干犯经学，却常常受到后者的攻击。经学家竭力想以自己的文学观规范赋家的创作，汉赋因之受到许多消极影响；但赋家在创

作中不能不受到文学规律的支配，在客观上常常表现与经学的对抗。”

赋的研究近年来颇为活跃，出现了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形势，朱一清《近年汉赋研究综述》较为具体地反映了这一情况，很可一读。一九八四年在汉赋研究中关于汉赋的来源的问题讨论引人注意。曹明纲《宋玉赋真伪辨》，虽然文章的重点在辨明《文选》所载宋玉赋不是伪作，但他肯定了汉赋作为文体“主要从‘不歌而诵’的意义上定名为赋，以区别于可以入乐的诗和专供阅读的散文。”这表明作者也不赞成传统的“赋，自诗出”的提法。接着作者论述了赋与楚辞的关系，他指出，楚辞“除了部分（如《九歌》）保留了诗的音乐性以外，大都（如《离骚》、《卜居》、《渔父》等）呈现出‘不歌而诵’的赋的倾向。这种作品发展到荀子、宋玉时代浸染于战国的纵横风气，更朝着韵散结合的方向发展，……但由于当时作家所受南北方传统思想文化的不同影响，赋这种文体出现了风格和形体都颇悬异的情况。荀卿赋的说理和所谓《诗经》式，正是他受北方儒家思想束缚和政治家气质的反映。汉初洛阳人贾谊赋‘志胜才’的特点和运用不那么自由的《楚辞》式，也表现出他虽然倾慕屈原，向往楚文化，但仍带着长期受北方传统文化熏陶的明显形迹。而稍后于荀卿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楚人，他们得南方地理和庄子、屈原之便，创立了散文赋体。汉兴以屠，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又多是南方人，他们比较容易接受宋玉赋的影响，为了适应汉代‘润色鸿业’的需要，巩固和发展了散文赋体，奠定了汉赋勃兴的基础”。康声《汉赋拓宇于楚辞质疑》对赋“原本诗骚”的观点提出了商榷，他说：“我们仔细研究汉赋的体制、构思、题材、结构形式、语言运用等，发现它和楚

辞作品的联系,除词采华赡这一点外,别的方面远不相似。而汉赋同先秦散文、秦及汉初散文倒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明显的传承迹象,可以证明汉赋主要源于散文而不是源于楚辞。‘赋’是散文整齐化、音韵化并且稍许诗化而形成的新文体,它在本质上应划入散文的范畴而不应列入诗体。说汉赋为‘古诗之流’是汉人用诗六义的‘赋’阐释赋体造成的混乱;说汉赋‘拓字于楚辞’,则是汉人笼统地称呼楚辞作品和汉赋作品为‘赋’而造成的错觉。”费振刚的《辞与赋》则指出楚辞来源于楚国民歌,而从《荀子·赋篇》的写作以及宋玉赋的一些特点,认为赋作为文体与先秦时代流行的“隐语”(即谜语)“存在着互相影响、互相承接的关系”。尽管以上说法论证的角度不同,目前似不能取得一致的看法,但都触及了汉赋作为一种文体的特点,并非绝然对立的。

一些具体论述汉赋作家生平和创作的文章,分析得比较具体深入,且有新意,如龚克昌《散赋作家枚乘》、束景南《关于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毕庶春《试论子虚、上林》等,都是很有功力的文章。但在汉赋的评价上,无论是思想上或艺术上,总的倾向是对于其成就、作用多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而对其弱点、不足则分析得不够,因而有的意见不免失于偏颇,章沧授《论汉赋对现实的批判》把汉赋作为一个整体,既包括所谓汉大赋,又包括抒情言志的各类赋作,指出汉赋有着对现实生活批判的广泛内容,指出汉赋作家既要劝谏又要免于灾祸,不得不讲究批判形式和方法,多数作品表现上有隐晦曲折的一面,这当然是正确的。但说“汉赋与乐府民歌有同样不可低估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又说“汉赋的作者不少是文学侍从,他们中的某些人迫于自身的卑贱地位和生活需求,确实写了